

本书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J13WD70)、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7 年度教学改革团队项目资助。

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及影响研究

范延妮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据统计,20 世纪初来华传教士 6600 人左右,其中医学传教士 300 人左右。这些传教士带着各自教会的使命而来,想通过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达到传播西学、收集地理和物产信息、传播宗教等不同目的。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他们是陌生而好奇的,部分传教士视其为鬼神之说,加以轻视诋毁;部分传教士被中医药的疗效所吸引,开始了解中医药学内容甚至开展各种研究和临床实践活动,这期间介绍中医药学的文章和著作有近百种,其中以对中药和针灸的介绍为主。这些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各种方式如书信,著作、日记、期刊文章等传播到西方,初步建立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医形象。他们传播的内容广泛,深度不一,既包括中医药学的理论部分如中医药学历史、文化、典籍等,又包括中医药学的诊疗手段如中药和针灸。中国传统医学在近代就是被这样一群来自异域的传教士介绍、翻译到西方的。

毋庸置疑,近代部分来华传教士扮演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帮凶的角色,这一点在顾长声教授所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详尽的叙述,特别是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军事、外交、政治、教育、慈善等领域中所开展的活动进行了有机的论述,极大丰富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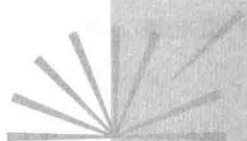


近代史的内容。同时在该书重印附记中,顾长声教授也指出,传教士上述活动的客观效果与他们的主观愿望有时会背道而驰,使他们客观上发挥了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作用,对此应做进一步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传教士的历史作用提供依据。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证据,发现证据就是找出“有什么”,然后才能辨识和判断出“是什么”,最后才能回答出“为什么”,这是马伯英教授在《中国医学文化史》一书中所提出历史研究的三部曲: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其中的第一部曲最为重要,因为这些初步的、琐屑的甚至是不合乎历史资料标准的东西往往是人类无意识深层结构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意识和因由,对历史的重建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有什么”,即将分散、零星的基础性史实进行梳理和挖掘,并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还原,管窥其中的规律和启示,为更多学者研究传教士这一群体提供砖石瓦块,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能力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范延妮

2017.12.9



目 录

Contents

- 序言 / 001
- 第一章 引言 / 001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002
 - 1.2 研究内容 / 007
 - 1.3 研究方法 / 011
- 第二章 文献研究 / 013
 - 2.1 近代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013
 - 2.2 传教士与近代中西医学交流的相关研究 / 015
 - 2.3 近代传教士与中医译介活动的相关研究 / 017
- 第三章 近代以前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 / 020
- 第四章 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 / 023
 - 4.1 对中医学的综合译介 / 023
 - 4.2 对针灸学内容的译介 / 037
 - 4.3 对中药学内容的译介 / 042
 - 4.4 对法医学著作的译介 / 051
 - 4.5 对解剖学著作的译介 / 052
 - 4.6 对中医养生内容的译介 / 053
 - 4.7 对中国医学史的译介 / 055
 - 4.8 对其他中医文献的译介 / 057
- 第五章 近代传教士开展中医译介活动的原因和特征 / 059
 - 5.1 原因 / 059
 - 5.2 特征 / 062
- 第六章 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促进和阻碍因素 / 065
 - 6.1 促进因素 / 065
 - 6.2 阻碍因素 / 066

● 第七章 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产生的影响及
启示 / 067

7.1 积极影响 / 067

7.2 消极影响 / 071

7.3 对当代中医对外传播的启示 / 074

● 第八章 结语 / 078

8.1 全面认识近代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
的作用 / 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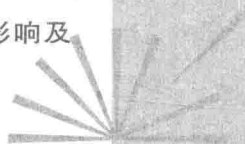
8.2 丰富近代翻译学的研究内容 / 080

8.3 研究启示 / 081

● 附录 / 084

● 参考文献 / 121

● 致谢 / 132



第一章 引言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1]。与其他文化不同,医学文化由于其战胜疾病、保护健康的特殊性质而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和动力^[2]。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医学对外传播的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秦朝时期的徐福,他曾经东渡日本,被认为是“医人把中国医术带入日本之始”^[3]。徐福因此成为中国和亚洲国家医学交流的重要使者。

中国和欧洲的医学交流最早可追溯至 11 世纪伊斯兰世界的阿维森纳(Avicenna, 980—1037),其著作《医典》记载了中国医学的脉学、中药等方面的知识。12 世纪《医典》被译为拉丁文,被欧洲医学界奉为经典,直至 17 世纪仍在欧洲的大学中作为教材使用,中国的医药学知识也就随着《医典》传至欧洲。徐福和阿维森纳均扮演了中外医学交流媒介的角色。由此可见,医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来往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才使得医学信息的交换成为可能。古往今来,发挥医学交流媒介作用的群体多种多样,有官方派出的医官使节,有活跃于民间的方士和商人,也有怀揣宗教信仰的医学传教士等,其中对医学传教士群体的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界的热点^[4]。

传教士来华的使命是传播宗教,同时他们也是西方科学文化的载体,这决定了他们热衷于“以学辅教”活动,即借用包括西医在内的西学的力量来推进宗教信仰在华的传播。他们为了传播宗

教而借用医学的力量在中国行医布道,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主要媒介,让习惯于中医的民众接触到完全不同的西医学知识和西医诊疗方法,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多元化发展。与此相关的研究与著作自20世纪20年代就陆续出现^{[5][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主要集中在其传播西医学知识、开办西式医院和医学学校等方面,并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些研究多聚焦于传教士向中国输入西医学知识,即西医东渐的过程,而对于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医学知识的研究较为鲜见。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传教士在把西医学知识带到中国的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解,对待中医学的态度从初始的否定、质疑到后来的同情、理解,更有部分传教士开始研究并向西方译介中医药学知识,为西方认识 and 了解中国传统医学打开了一扇窗口。在开展中医译介活动的过程中,传教士所怀目的各不相同,所做的译介工作各有重点,所产生的影响涉及海内外,这些都成为本书关注的内容。

1.1 相关概念界定

“近代”概念的界定

近代的含义,在时间上是指1840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7]。在这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剧烈变动,内忧外患不断,人民饱受战乱之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欺压,激起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要数太平天国农民

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虽然这两次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最后以失败告终,却极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震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

19 世纪下半叶,在国势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晚清统治阶级中的部分开明官僚和士绅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开展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使清政府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与压迫。进入 20 世纪,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共合作等,这些历史事件正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自强道路、寻求民主和平精神的真实写照。20 世纪 30 年代初至 40 年代末,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于在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史长河中也从近代社会阶段进入现代社会阶段。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西方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后,在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迅速超过中国,而此时的中国由于政治封闭、经济落后、思想僵化等原因已明显落后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脚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社会的剧烈变化和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体系,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态势,出现了“新旧学之争”和“中西学之争”,渗透在哲学、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复杂而多变的发展局面。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和中西医文化交流就是在此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与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来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活动以及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

“传教士”概念的界定

传教士是指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8]。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

仰,以及与信仰相关联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即整个生活方式。他们坚信,只有用基督宗教彻底改造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才能完成其传教使命。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的传入与佛教、伊斯兰教不同,主要不是靠边界居民流动渐次传播,而是由传教士直接传来的^[9]。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又称耶稣教或基督教),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分属于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本书对此不做细致区分,重点放在传教士所开展的中医研究和译介活动上。

据统计,鸦片战争以后至1900年,在中国的传教士医生有195名,到1913年达到450人,到1925年这个数目达到600人^[10]。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一席。在西方学者看来,这是探讨中西两种文化的复杂碰撞过程和展示东西两个完全不同价值系统、不同信仰的文化曲折发展过程的必涉之地。在国内,由于多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出现专门性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块领域才得到关注,继而成为研究热点。

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教,除此以外,很多传教士还试图输入现代科技知识和西方人文社科知识,即广义的西学,来改造中国,这不仅是因为西学与基督教相互关联,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企图借用西学的巨大力量来推进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在近代西学传入的过程中,医学始终处于重要的领先地位。19世纪初,部分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办诊所和医院,引起中国医界人士关注,特别是牛痘法在华的迅速传播,加速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战乱不断,人民饱受疫病疾苦折磨,急需接受迅速、有效的诊疗,而此时西医在外科、眼科等临床手术上见效快、痛苦少的特点很有吸引力,加之传教士开办西医院、建立诊所、翻译医书等新的传播手段,使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逆反心理逐渐减弱,慢慢接受了西医在治疗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形成了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特殊现象:不仅西医院、医学学校大多是教会和传教士所设,当时译著的西医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手^[11]。

在传播西医学知识之余,久居中国的传教士也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所吸引,部分传教士热心于研究和译介中医。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医学,帮助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取得西方支持,从而推动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对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发现中西医学的相似性,以此说明东西方医学文化的同根同源,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空间安置上帝。传教士对中医的译介研究散见于他们的来华游记、见闻录、自传和书信中,也有一些专业素养较高的传教士开展了专门研究,如翻译中医经典著作、实地考察中药、分析中药成分等。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期间,来华传教士、医生等人员较之前有所增加,其中对中医药感兴趣的人士开展了翻译和介绍中医学活动,所撰写的专著和文章约有近百种,成为西方了解中医药学的主要途径。值得指出的是,近代西方的大多数医生、学者、研究人员等都归属于某个教会,受到不同教会的指派来华传教行医,他们的身份往往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宗教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或某一岗位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在其著作或文字中论及的有关中医学的内容均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概括而言,传教士来华的动机虽然复杂,但在客观实践中他们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又将中国的科学技术介绍到西方,在中国和欧美西方国家处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挥了媒介的作用,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医译介”概念的界定

本书所使用的“译介”为翻译和介绍的简称,包括翻译中医经典著作和介绍中医学相关知识,二者都是中医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中医药学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与西医药学在理论基础、思维方式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中西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使用不同的医学语言。因此,中医的对外传播首先要克服语言

障碍,需要有通晓中外语言的群体将中医药知识翻译和介绍到西方。在近代中国,直到20世纪初期才有出国留洋的人才陆续归国,因此中国本土通晓医学和外语的人才虽然有一些,如近代的王吉民先生,但较为匮乏。而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为了行医传教的顺利进行,往往投身于汉语的研究和学习,具备了翻译和介绍中医药知识的条件。另外,有些医学传教士亲眼看见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产生了研究兴趣,有些传教士甚至在行医过程中尝试使用中药为病人治病。

在中医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医经典著作和书籍的翻译是一种重要形式。中医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构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自古至今对中医临床诊疗、教学传承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多数中医著作和书籍系古代汉语写就,文字深奥,寓意深邃,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翻译成另外一门语言难度就更大了。即便如此,要使其能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必须通过翻译这种语言转换手段,为中医走向世界架起一座桥梁。李照国^[12]曾指出,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中医对外传播和翻译活动主要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医学家所承担,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翻译工作约始于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传教士参与的中医著作翻译活动在近代中医药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译就的著作有助于当时的西方了解中医的理论基础和诊疗特色。

除了翻译中医典籍,在著作、文章、书信、自传等文献中介绍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疗效也是当时传教士传播中医的一种方式。传教士根据在中国长期工作和生活的观察,不断与西方进行信件交流,介绍中国国情和社会情况,并编撰、出版了很多著作和调查报告,成为当时欧美国家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医学传教士在编撰有关西医学著作、个人自传、刊物、社会调查报告等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涉及中医药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零散浅显,却成为一幅幅生动直观的图画,在西方人的脑海里描绘出中国传统医学的初步印象和

轮廓。译介活动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媒介,成为来华传教士行医传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东西方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13]。

中医译介在本书中不仅指将中医译介到英美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而且包括以法语、德语等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使用不同的语言翻译和介绍中医到西方,一些优秀的著作如对《本草纲目》和《救荒本草》的译介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美连续出版发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本研究中涉及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教会,他们所使用的翻译语言各不相同,在本书中非探讨重点,不做深入分类。

1.2 研究内容

以近代中国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近代来华传教士所开展的中医译介活动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并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将近代传教士开展的中医译介活动细分为八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译介活动的原因、特征、促进和阻碍因素,探讨传教士在中西医文化交流和译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译介活动对西方社会、中医西传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当今的中医对外交流与传播有所启示。按照近代传教士译介的中医内容分类论述,包括对中医学的综合译介活动、对针灸学、中药本草学、法医学、解剖学、中医养生术及中医医学史的译介活动。在每一部分里面,按照传教士所属的不同国家进行论述,在同一个国家里,按照时间先后对译介内容进行描述。这样的论述顺序有利于发现和归纳传教士译介中医过程中的翻译选材特点、不同国家的参与程度、不同时间段的译介重点,从而形成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发展变化的脉络。在此基础上,论述力求点面结合、以点带面,既有全景式的概括总结,也有个案式的重点描述,对在近代中医译介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教士个体详加论述,展示其在中医译介的方法和内容上的特点,使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有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和认知。

在结构上,本书共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阐述了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并对书中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分别讨论梳理了国内外对近代传教士的研究、对近代传教士与中西医文化交流的研究、对近代传教士与中医译介活动的研究;第三部分简要回顾了近代以前传教士开展的中医译介活动;第四部分从八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传教士开展的中医译介活动;第五部分分析了近代传教士开展中医译介活动的原因和特征;第六部分讨论了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促进和阻碍因素;第七部分探讨了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产生的影响及对当今中医对外传播的启示;第八部分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

本研究所参考的资料来源于中外各类文献著作、期刊论文、学术论文、传教士传记等。涉及的门类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国翻译史等,还包括关于传教士与中国科学、传教士与东学西传、传教士与中医传播的相关资料等。

研究发现,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原因包括传教士考察、探索中医药资源,促进在华传教工作,弥补在华行医西药的不足以及折服于中医的神奇疗效等几个方面。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学的内容介绍多于翻译,二是借助了中国医生和学者的帮助。促进传教士开展中医译介活动的因素主要是传教士群体专业素养的提高,阻碍因素是中医译介与传播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

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对中医西传、对西方医学的发展、对西方汉学研究、对近代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消极影响表现在部分传教士对中医的“误读”使得中医在西方被片面理解甚至曲解。

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首先对中医西传产生了深远影

响。在中国历史上来华的外国人中,传教士可算是顽强型的社会群体。他们凭借内心的信仰和顽强的精神,不仅将宗教信仰带到中国,还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梳理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可以发现这种活动对中医西传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几乎处于隔绝的情况下搭建了桥梁,将中医药知识和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在西方医学界的视野中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传教士自身保守的宗教观念和功利目标影响了他们对中医的译介活动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使其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尽管有时存在种种偏见和误读,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对西方近代科学和医学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马伯英指出,中国的博物学知识,特别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直接支持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而这得益于“传教士将中国古书内容辑录传播到欧洲”。

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对西方汉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拓展了汉学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中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传教士的中医译介工作自然也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医学被译介到西方后,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催生了新一轮的“中国热”。包含中医文化的近代汉学在西方的兴起表明中西文化交流既是人们思想相互嬗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取舍和吸收的过程。

研究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可以丰富近代翻译学的研究内容。东西方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是影响西方人正确理解中医文化的主要障碍,翻译理论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尽量减少这种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近代传教士出版的译介中医的著述无疑成为近代翻译研究的重要素材。曾尔奇曾指出,近代我国翻译领域中存在着“引进”和“输出”的严重逆差,翻译作品中“外译中”的占绝对优势,而“中译外”仅寥寥数笔。在此背景下,传教士开展的“中

译外”即中医译介活动就显得尤为可贵,对其进行梳理和研究必将充实和丰富近代翻译研究的内容和视角。

近代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由于中西医在医疗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众多差异,传教士们有时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医的治疗原则和理论基础,加之传教士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自身科学素养不同,在译介中医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读”,对中医文化的对外交流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和中医的接触过程中,部分来华传教士认为中国传统医学在诊断、治疗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对疾病没有病理上的解释,只是传承古人的经验,甚至在治病过程中保留了很多迷信观点。他们也发现中医从业人员鱼龙混杂的现象较多,缺乏严格的考核认证,庸医误病较为常见。传教士对中医的外科、针灸、中药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负面译介,在西方产生了消极影响。

研究该历史活动对当代中医对外传播也有所启示。首先,中医对外传播应从被动输出转变为主动输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加强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发展任务,来自中医学、外语、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学者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医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但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近代以来,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经由传教士之手传到欧洲,产生广泛影响,并不是中国有意而为,而是西方国家主动引进、积极输入的结果。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内部有一股主动探寻、吸收外来文明的强大动力,而这种动力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缺乏的。

其次,在分析西方需求的基础上选择输出内容。社会对异文化的接受具有一定选择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对于自身文化欠缺的东西,其需求度和持久度就会保持高水平的状态。西方在引进东方知识和文化时也会有一定的选择性,只会取其所需,弃其所余。鉴于此,开展中医西传时应针对西方医学的弱点,如西医较难治愈的慢性疾病、疼痛类疾病等,突出中国医学的优势,如人

文关照、副作用低等,使交流双方都得到益处。

最后,提高中医自信心是促进中医对外传播的基石。回顾 20 世纪上半叶一些试图废除中医的企图,不难发现他们在面对西医科学的洪流时,轻易放弃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坚守了几千年的中国医学,他们以西方医学的所谓“科学性”准则来评价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全面否定了中医的理论价值和临床疗效。进入 21 世纪,废除中医之声又起,说明中国部分学者对本国传统医学的存世价值和疗效仍信心不足,如何加强这种对中医的自信心和诠释力,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对传教士群体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史实的支撑和客观的审视视角。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同时把包括中国医学在内的中国优秀科学文化传播到西方,使中国科学文明参与并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传教士自身或浓或淡的宗教色彩影响了他们对东西方科学知识的把握和传播效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献学方法搜集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中医译介活动的相关文献资料,内容涉及近代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传教士的概况、传教士开展的中医译介活动及其动因和影响因素、该活动的特征和产生的影响等。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总结,梳理出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包括对中医的综合译介、对针灸学的译介、对中药本草学的译介、对中医法医学的译介等。在此类别下,再按照不同国别的顺序进行讨论,点面结合,以期勾勒出近代传教士中医译介活动的全景图。本研究在充分利用本校和山东省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电子数据库的基础上,参考了《中国医学通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传教士与中国科

学》《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等著作和其他多种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还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近代传教士翻译的中医著作的原本,如伊博恩于1946年译介出版的英文版《救荒本草》等;近代历史时期国内外出版的早期文献资料,包括多位来华传教士的自传体著作,如传教士胡美1949年撰写出版的回忆录《道一风同》、丁韪良于1896年撰写出版的自传《花甲记忆》等;在华基督教组织于1922年编写出版的调查报告类著作《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又名《中华归主》);传教士伟烈亚力于1867年撰写出版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85年编译出版的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国内学者王吉民、伍连德于193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医史》;王吉民、傅维康于1963年编著出版的《中国医学外文著述书目(1656—1962)》;医史学家陈邦贤于1920年撰写出版的《中国医学史》等。此外,通过图书馆馆际文献查询和传递功能,获得了国外期刊上关于医学传教士的大量英文文章,这些由传教士和国内外学者出版发行的早期著作和文章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和素材。

本研究采用的另一研究方法是描述性的方法,对传教士的中医译介活动进行描述和展示,探索影响其译介活动的各种因素及这种译介活动对西方所产生的影响。描述性研究方法包括共时性描述和历时性描述。共时性描述针对某一历史阶段所发生的译介活动,如探讨20世纪初的译介活动呈现出的特征和规律;而历时性描述从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活动中发现其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如近代以前的中医译介活动以针灸学内容居多,而近代以后以本草学内容居多。